

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

高 華**

摘 要

本文針對三方面的批評做出回應：第一個方面是片面性，專講中共領導人之間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不講中共領導人的崇高信仰和寬闊胸襟；第二個方面是延安整風乃共產黨全黨共襄盛舉，不應該責以民主自由或人道主義的價值；第三個方面是既同情中共革命又否定中共革命，思想呈現矛盾。本文針對這些批評，一一加以回應，尤其針對「老延安」何方先生的指教，提出商榷。本人認為當局者迷，許多指教只有論斷，卻無論證，何方先生老延安的優越感導致他誤讀本書，而其一意追求歷史定論，也造成他無法容忍異見的獨斷傾向。《紅太陽》一書不允許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然新出資料也證明本書主要論點是站得住腳的。《紅太陽》的修訂再版，將修正個別史實錯誤，其基本架構則維持不變。本文最後指出延安整風經驗的特殊時空背景，建國以後奉為治國方略，造成歷史災難；鄧小平宣布與時俱進，加以揚棄，只是變得較遲，令人遺憾。

關鍵詞：紅太陽、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

* 收稿日期：2009年8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9日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幾種批評意見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為《紅太陽》）一書出版已近十年，¹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來信，希望我對該書出版以來讀者的反應做一回答，並就修訂再版事，向讀者預做說明，因此催生了這篇文章。承蒙讀者的厚愛，這十年來我收到國內外及港、台地區許多讀者來信，甚至有來自遙遠的希臘克里特島。這些來信絕大多數都對本書表示肯定、讚許與鼓勵。與此同時，對本書也有若干批評的意見，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一種意見認為我的書「傾向性」較強，對毛的「權力鬥爭」寫多了，而對其理想層面較少著墨；還有批評認為本書把延安領導層都寫成爭權奪利之徒，違背了「一分為二」的原則

有關這方面的意見，大多沒有形諸文字，只是一種私下議論；個別的是以著述議論的形式表達的，如何方先生的批評。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多年的何方先生，是一位 1938 年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他認為應運用毛澤東提倡的「一分為二」的方法來研究延安整風。²何方認為：「延安整風是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層包括多數高級幹部在內的共同襄舉」（下，頁 689），批評《紅太陽》一書「把黨的領導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廣闊胸懷的爭權奪利之徒。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爾虞我詐，就是勾心鬥角；……幾乎看不到什麼團結互助、患難與共的同志情誼。」（下，頁 690）「就是毛澤東，也不能說他完全是搞『權謀政治』，一切都是為了抓權」（下，頁 690），「不能把延安整風完全看成上層一些人的爭權奪利，加以庸俗化。」（上，頁 226）他並指責本書「從

¹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此後引自本書的內容均在正文中標明頁碼，不另附註。

²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上冊，頁 221，此後引自本書的內容亦均在正文中標明冊數、頁碼，不另附註。

一個不真實的前提出發，認為延安整風主要是針對王明及其後台斯大林(Joseph V. Stalin, 1879-1953)和共產國際，而且取得了勝利，掃清了蘇聯影響，實現了獨立自主」，由此判定我「沒能完全從幾十年來關於延安整風的主流宣傳和相關資料中『獨立』出來，而且帶有相當成分的主觀臆測」（下，頁 689），「陷入了誤區」，「誤入歧途」。

2. 認為向共產黨要民主是找錯了對象，「不左」還是共產黨？整風是黨的運動，局外人不應多言

遇賓州教授（某著名學者的化名）在對本書的書評中寫道：「『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吗？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整風』是黨的運動，黨要搞運動，我等黨外人沒有置喙餘地。」「整風」如果只整黨人和熱愛黨的人，就沒有什麼不正當。「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或社會民主黨，向共產黨要求『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可能一開始就找錯了人。『整風』中迫害的知識人，誰不熱愛共產黨？受迫害為甚麼不逃離延安（書中僅提到兩例逃出）？經過運動後，受迫害者不大都變成了以後『運動』中整人的人？」³

3. 認為作者有思想矛盾

法國華裔學者陳彥博士書評稱，從本書的思想邏輯演進應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結論，但作者卻對中共革命深表同情；⁴蕭功秦教授也認為，本書隱隱透露出作者的某種思想矛盾：在作者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一面持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⁵

³ 遇賓州，〈誰是「我們」及其「敵人」〉，《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頁144。

⁴ 陳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頁143-148。

⁵ 蕭功秦，〈拒絕殘酷的美麗〉，《明報月刊》，2000年第10期，頁106-107。

二、對批評者的回應

一本書出版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幽幽歷史迷宮中上下求索，本來就是一場智力探險。對《紅太陽》一書，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評價本書，包括指證該書的不足或缺點，對於作者都是教益。本書出版十年，我很少對這本書談論什麼，書既出版，讀者自可比較、鑑別，已毋須作者多言，只是此次出版社令我命題作文，才不得已爲之。

1. 關於「傾向性」和毛的「權術」是否寫多了？

在對本書的批評意見中，一種看法認爲《紅太陽》一書有較強的傾向性，具體而言，就是對毛的「權術」寫多了。我認爲，一個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特別是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時，不可能沒有他的價值傾向。十年前，我在本書的〈後記〉中說，我認同五四的基本價值，十年後，我還是堅持認爲，一個學者在研究諸如五四、抗戰、內戰、整風、反右、文革等，是不可能心如古井的，如果研究的是明代的鼻煙壺，那可另當別論。關鍵的是，作者的「傾向性」不能妨害他作爲學者的客觀性和公正性，特別是在處理史料上的平衡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這點。

我們試檢閱一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民國史、中共黨史的研究，哪一個沒有作者的「傾向」？從更廣義的角度講，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經由歷史學家的眼睛，才發現並表達了出來，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又可以說，歷史——它是客觀（歷史事實）和主觀（歷史學家的書寫）互相作用的結果。

正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說，人們通常認定的歷史中有一部份並非是真正的歷史，只有被表述的歷史才可能是歷史。爲什麼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這必定有選擇，換言之，即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歷史，都有其主觀性。」⁶歷史不僅是指過去的事實本身，更

⁶ 葛劍雄、周筱簃，《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72。

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有意識、有選擇的紀錄。⁷於是作出結論，寫歷史的人當然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

至於對毛的「權術」是否寫多了，我認為在對毛的研究中，過去人們多關注毛的「義理」層面，而比較忽視、迴避他的「權力操作」層面，這對於瞭解毛和他主導的歷史過程，顯然是不夠的。毛的「君師合一」地位奠定於延安整風，這是《紅太陽》一書敘述的重點。在該書的〈前言〉中，我寫得很清楚，毛發動整風運動有其思想追求，「延安整風運動是……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紅太陽》，頁 xii）革命黨本來就以奪權為目標，毛作為一位革命領袖，他看重權力，這有什麼可諱言的呢？我在該書中確實寫了中共歷史上一些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何方先生讀出「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味兒，別人也可能會讀出和他不同的感受。

法國的陳彥博士就從我的書中看到「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⁸陳彥說我筆下的毛，既相信自己的權力，也相信自己的理想；而何方先生則認為我把毛寫成了「一切為了抓權」。就毛與「抓權」而論，事實也並非如何方所認為的，毛似乎僅關心「思想」。1986年，主管軍事的政治局委員楊尚昆在一次小範圍談話中談到毛，楊說：「他就是要把權都抓到他手裏」，「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來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這個權」。⁹楊尚昆的話充分印證了我書中的分析和判斷。

⁷ 葛劍雄、周筱簃，《歷史學是什麼》，頁 73。

⁸ 陳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頁 144。

⁹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頁 33-34。

何方先生對我書中的「班底」、「內管家」這類說法甚為不滿，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同樣是何方，卻有毛澤東以「家臣」待羅瑞卿之說法（下，頁 580）；而在接受鳳凰衛視中文台《口述歷史》節目（2005 年 1 月 29 日）的採訪中，何方先生更直呼毛澤東為「老頭子」。「家臣」也好，「老頭子」也罷，問題並不在此，而是怎麼到了他筆下就可以用「家臣」，而別人用「班底」就不對？

我自認為在書中對毛的描述是客觀的，也講了他的「理想」層面，或許比重不多，但研究毛之「理想」的論著早已汗牛充棟；況且論毛並不一定就要規定論述比重，歷史學是人文學，不是計量學和統計學。對一個深刻影響了中國和世界，一直掌權到生命最後一刻的大政治家，不僅要研究他的「思想」，還應研究他的「權力操作」層面，在那些「深掘義理」的書之外，我的書就作為一家之言，聊備一格，僅供參考吧！

2. 整風是不是全黨「共同襄舉」？是不是主要針對王明及其後台？

許多領導幹部參加整風，這不是他們可以選擇的，他們各自的處境更是完全不同的，有整人的，也有被整的；如果說只要參加了整風就是「共同襄舉」，那麼王實味都可以囊括進來，難道可以這麼說嗎？至於整風是不是主要針對王明及其後台？這不是一個問題，整風主要當然是針對王明及其後台，這不是「進入了」或「陷進了」什麼傳統黨史所設置的「誤區」（下，頁 692、696），因為這是事實。何方先生認為我「沒有逃出二手材料的影響」（下，頁 701），也就是受了官方「事後諸葛亮」看法的影響，因為整風之初只是整張聞天，到 1943 年才觸動王明；其次，當時他和一批「老延安」都沒聽說到「王明路線」一詞；第三，在延安和建國後，中共是聽命和崇拜斯大林，對蘇「一邊倒」，說當年整風是整斯大林，那是毛在蘇聯批斯大林後才說的，所以也是「事後諸葛亮的論斷」云云（下，頁 669）。

在我的書中，已經詳細地分析了毛澤東和王明的分歧的由來，而且明確指出：整風在上層是以敲打張聞天開始，從博古再牽出王明。1941 年後，毛要清算歷史，批判內戰時期的中央路線，張聞天首先認輸，繳械投降，博古接著

認錯，王明暫未被涉及，但已點明他在武漢時期犯有錯誤；恰共產國際來電，要八路軍出擊以牽制日軍，王明出來批評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還批評中央對國民黨的路線太左，引起毛和政治局多數的反擊，逼使王明生病住院。1942年，毛的主要精力放在進行下層革命，第二年，轉入上層，從此，毛將王明、博古一鍋煮，原稱「博古路線」，後改為「王明路線」。而這個所謂「王明路線」的概念也只在黨內上層傳達而不往下傳達，將其完全公開是在1960年代初，到文革就家喻戶曉了。

毛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沒動王明，那是先打其外圍，把王明徹底孤立起來；也是看蘇聯人的反應，1943年春共產國際解散，而「搶救運動」所造成的震懾力也已形成，毛就放開手腳向王明全面開攻。毛之所以揪住王明不放，不僅是因為王明在1941年的9月政治局會議上當面挑戰了他，更重要的是在1931年後王明就是「留蘇派」的領袖，在共產國際也有較大影響。雖然1935年後，「留蘇派」早已四分五裂，互相攻擊，但是在國統區輿論上，在國民黨那裡，都是把王明看成中共「留蘇派」的「頭兒」的。

毛與王明的糾葛，其實質是毛要以自己的思想去解釋、轉換俄式馬克思主義。例如，確立農民最具革命性、軍事第一、知識分子必須長期改造、「洋教條」有害革命等思想，並將其上升為「毛澤東思想」，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也要用斯大林那一套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將全黨對斯大林的崇拜轉渡到對他本人的崇拜；他還要改組中央機構，一方面把「留蘇派」清出中央核心層，一方面把支持他、擁護他的劉少奇、彭真等人提拔出來，實現以他為核心的一元化領導。這些在當年的國際共運中，堪稱創舉，因為鐵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也沒有弄出一個「鐵托思想」，這些當然可以稱為「獨立自主」。

何方認為我對整風的認識錯了，他說我相信整風是「掃清了蘇聯的影響，實現了獨立自主」，他在我的書中找不到這些話，於是就很費心地在網上找出我的一篇論文〈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我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毛在延安領導開展了一場以肅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為目標的思想和

組織重建的工程。在那幾年，毛並不那麼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黨刷清了積存多年的蘇聯崇拜情結，並把黨內的「國際主義」代表人物趕下了台。¹⁰

「掃清蘇聯影響」和「掃清積存多年的蘇聯崇拜的情結」是兩回事，說到底，毛對共產國際，除了有「受不了」的一面，還有「離不開」的一面。從毛的角度，中共離不開國際的幫助，包括理論的幫助、政治上的幫助，甚至是經費等的幫助，例如，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就帶回了蘇贈中共的三十萬美元的支票。抗戰期間，只要國民黨一打壓中共，蘇聯在重慶的大使就會出面對國民黨施加壓力，為中共解圍。

同時，毛「受不了」共產國際的干涉，中共和共產國際原是上下級的領導和服從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嚴格聽從國際的命令。到了1935年後，共產國際的干涉減少，毛的自主性有了成長的空間，才有可能逐步把黨內的「留蘇派」清除。

只要莫斯科不干涉毛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毛「人前人後都對斯大林表現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給壞人王明也選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後台是斯大林的敵人布哈林！在那個年代，全黨上下，除了個別人，誰都不知道毛對斯大林的真實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語言將他內心的想法表達出來。」¹¹正是因為對共產國際，離不開，又受不了，「剪不斷，理還亂」，所以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把共產國際與王明、博古區別開來：毛歌頌斯大林，也學著斯大林的一套，做中國的斯大林，卻批判他在中國的代理人王明、博古等。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更是處處注意和蘇聯搞好關係，不准黨內有任何對蘇不利的言論，違者以「反蘇分子」論處，八路軍高級將領，長征幹部盧冬生被東北的蘇軍無辜槍殺，毛只當不知道。

由於存在著這種微妙的關係，傳統黨史長期不討論王明的後台問題，1960

¹⁰ 高華，〈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頁114。

¹¹ 高華，〈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頁117。

年代初進行「反修」鬥爭時，陸定一在內部談過幾次，在文革中就被說成是「惡毒反斯大林」。直到 1980 年代正統黨史扯出這個話題來，大談毛的「獨立自主」，由於當時不說，事隔幾十年，又說得太多，很容易被懷疑是灌水，但是平心而論，問題的實質並沒有說錯。

對於毛的這種兩面手法，一些人到現在還看不清楚，他們只看到《整風文獻》中收有多少斯大林的文章，毛又是如何號召學《聯共黨史》，就一口咬定整風反共產國際教條主義是子虛烏有，說什麼「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上，頁 209），甚至還批評起毛對此問題的解釋——毛在 1956 年說：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說情況不是像毛這樣說的（上，頁 153），此可謂只知表象，不見實質了。

蘇聯人對毛的這套手法心知肚明，斯大林對毛，有意見是一回事，但知毛有實力，從來對他另眼相看。除了 1943 年 12 月 22 日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882-1949)對「搶救」表示質疑的電報，莫斯科對延安整風基本沒有干涉，因為斯大林的中國戰略需要毛。中國以後遇著類似情況也是這樣做的：金日成在 1950-1960 年代清洗朝鮮黨內親華派，中國基本上不干預；紅色高棉在 1975 年勝利後大肆清洗華僑，中國同樣不吭聲。

3. 王明在延安沒什麼影響嗎？

何方以自己在延安當年的「感覺」，批評我的書中有關王明一度在延安很受青年的歡迎，「四出報告」，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等等，「就多屬虛構」（下，頁 692）。他還說，「近年同幾十位老延安一再談起，都認為王明是建國後硬被作為反面教員吹起來的」，「延安的知識界絕不會把王明放在毛澤東之上」（下，頁 692）。我想指出的是，他說的不錯，但還不夠，當時的國民黨，他們更看不起王明、博古、張聞天，國民黨和斯大林一樣，只看重毛澤東。我的書中早寫到，長期以來，在蘇區紅軍中，只知朱毛，不知王、博、洛，所以何方說的多數人在 1938 年後才知道王明這個名字，這是完全可

能的。就是知識分子或文化人，他們不知道王明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去延安的青年四面八方，來自北方和西北小縣城的青年因資訊缺乏，沒聽過王明的名字，但是在上海、江浙一帶，以及北平、武漢、香港的左翼青年，特別是周揚、胡喬木、夏衍等，許多人在 1936 年就通過共產國際的中英文報刊看過王明寫的鼓吹建立統一戰線的文章，早就知道王明的大名。

至於何先生說，他沒有我書中說的王明在延安受歡迎、被推崇的「這種感覺」（下，頁 692），我想說的是，個人的「感覺」常常是靠不住的。我的有關敘述都是根據當年的歷史資料而來的。我手頭的一本 1938 年 1 月在西安出版的《生活在延安》一書，就稱王明是「被千百萬人敬仰著，愛戴著的領袖」。王明 1937 年 11 月底回延安後，隨即去武漢，1938 年 2 月，從武漢回延安，特別是從 1939 年回到延安後，在各學校做報告受到熱烈歡迎，這在當時的報刊都有報導。1952 年香港出版的司馬璐的回憶錄《鬥爭十八年》中更有具體描述。當年他曾先後在延安抗大、敵區工作幹部訓練班、《新華日報》駐延辦事處以及新華社等文教機構學習和工作，經歷比何方豐富得多，且何方去延安是 1938 年「秋末冬初」，已遲於司馬璐近一年。近年來司馬璐寫的回憶錄還提到，1937 年底他到延安，在街頭牆上「還依稀見到『王明同志萬歲』、『擁護中國和世界革命的領袖王明同志』的標語。當時『王明』兩個字在延安紅得如日中天」。¹²他並舉例說，有一回王明到抗大演講，抗大教育長許光達向大家介紹說：「王明同志不僅是中國革命優秀的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優秀的領導者之一。」抗大副校長羅瑞卿也在場，但「態度嚴肅」。¹³據司馬璐說，王明在講話中還很謙虛地表示：「王明和大家是一樣的，我們都是革命同志」，「毛澤東同志是我們最敬愛的領導者，全黨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¹⁴同在抗大的何方沒有說起王明去抗大做報告之事，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時間久遠，人的記憶又是可以選擇和過濾的，何方有關對王明在延安

¹²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頁 351。

¹³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頁 352。

¹⁴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頁 353。

的「感覺」，只能作為一家之言，錄以待考了。

4. 關於對張聞天「貶低」的問題

何方先生是張聞天的老部下，對張聞天有著深厚的感情，徐向前生前回憶西路軍失敗，他回延安後曾被張聞天批評，何方就說，徐向前「可能寫得有些過份」（上，頁 83）。楊尚昆回憶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何方就認為楊尚昆的看法前後不一，因為楊原來說過，張聞天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而楊的回憶錄又改口了，「就是要使楊的意見和黨史學的正統口徑保持一致」（上，頁 139）。其實，楊尚昆的不同說法並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不必死摳字眼。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楊尚昆所說的由張聞天決定由毛負責軍事工作，也就是毛參加常委，在軍事上輔助周恩來的意思，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由張聞天一人決定毛的工作的。

對於張聞天，我的角度和何先生是不一樣的，張聞天肯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元老，但是我只把他當作歷史人物，依著史料和我對他的理解進行敘述。我在書中提到，張聞天盡力維護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而這是和他的政治前途有密切關係的，事實就是這樣，我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任何不懷偏見的讀者，從我的書中都不會讀出我對張聞天有什麼不敬，即如前引陳彥對本書有關張聞天的敘述的看法，但到了何方先生那兒，怎麼就被解讀為我是在強調張的「地位觀念」（下，頁 690）？我在書中提到毛對張聞天領導的延安學習運動的不滿，用一段文字描述了當時的歷史氛圍，以表現站在毛的角度，他是何等不能忍耐張聞天提倡學習馬列原著的活動，可是何方卻指責本書對學習運動的敘述是「沒有完全根據歷史事實臧否歷史人物」（下，頁 690），他自己不也認為張聞天對學馬列的安排和毛的期望有衝突嗎？為什麼他可以說，我就不可以呢？

何方先生認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等等，批評我陷入了誤區，「相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等」，情況果真像何

方指責的那樣嗎？我的書中說，遵義會議後，毛很快掌握了軍權，繼之把領導向黨務延伸，1938 年後又奪取黨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我在什麼地方說了何方例舉的那句話？我從沒有否認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成爲總書記，但是，毛在周恩來的配合下，不久就掌握了最重要的軍權，在戰爭環境下，這是最重要的。儘管張聞天在對黨的政治指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會議前，還一直擔任總書記的職責，但是誰是核心或主導人物，在「毛大帥」和張「明君」之間，孰重孰輕？事實明擺在那兒，許多時候，僅看歷史文字是不能瞭解歷史真相的：毛是有「實」而暫無「名」（份），張是有「名」（份）而無「實」。這類故事在中國歷史上還少嗎？所以，張聞天與毛的合作，是以毛爲主，而毛對張，很快就不滿意了。歷史當事人楊尚昆的看法要比張聞天、毛的電報署名的順序更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楊尚昆說：從長征後期開始，毛和張聞天的關係就有裂痕了，「後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了」。毛「以後對洛甫的態度就不是與人爲善的態度，而是諷刺挖苦」。1939 年楊尚昆第一次回延安，「就感覺得到不那麼對頭了」。1940 年楊調回延安，「聞天當時就只管宣傳，別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時很苦悶，……見他成天在剪報」。「甚至於毛主席在延安講過這樣的話，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還把著這個位子不讓出來」。後來「聞天跟他（毛澤東）去談過一次，這是聞天跟我（楊尚昆）講的，這個事情我統統交給你（毛澤東），我不管了，一切聽你的。毛主席當然欣然接受了。」¹⁵這就是張聞天在延安的真實情況，不是對張聞天有沒有感情的問題，而是那時的事實，所以我在書中提到遵義會議後，特別是 1936-1937 年後，毛雖無「總書記」之名，實際上掌控一切。何方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他自可以保留。

5. 所謂「紙上談兵」的問題

何方批評我「從書本到書本」（上，頁 302），「多少有點紙上談兵」（上，

¹⁵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頁 33。

頁 225)，在他未成書前的文章裡（〈筆記之十二〉）更是直截了當地說了：「因為他（指高華）沒參加過延安整風，也沒有找什麼活材料（如採訪一些過來人）」。在這裡，何先生實際上是說能否研究延安整風的首要條件，就是必須親身參加過當年這場運動。依這種邏輯，今天的古代史或近代史研究都應當全部取消。其實一些歷史事件的經歷者，因當年身處一隅未觀全局的，比比皆是，即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有親歷延安整風的老同志在給我的信中說，儘管在延安八年，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對整風運動，只知道他所在單位的情況，而對其他一概不知，還是從我的書中才瞭解了整風的全貌。和強調「資格准入」的何方先生完全不同，也是親歷延安整風的李銳先生，就從沒有把延安整風研究看成是自己的專屬領地，他總是熱情地鼓勵更多人也來參加這項研究。因此評論他人是否為「紙上談兵」，還是應以論著本身論，而非其他。

6. 關於「不左還是共產黨？」

遇資州教授說，延安整風的成功關係到中共革命的勝利，他說得不錯，我在書的〈後記〉中說過：「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紅太陽》，頁 655）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係，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即如遇資州所說，共產黨「整風」如果只整黨內，「干卿何事？」問題是，「整風」因有效而形成範式，建國後馬上就整到黨外，從「思想改造」到「反胡風」，「審幹肅反」、「反右運動」，最後到「文革」，一直整到普通百姓，都要強制接受「規訓」，那就不對了。

遇資州教授提到，為什麼當年在延安挨整的人以後又整人？在毛時代，這確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的看法是經過延安整風，那些革命知識分子獲得了雙重身分：一方面，他們是毛話語的宣傳者，擔負著鼓動、教育、改造群眾的

重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帶有「舊階級和舊意識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斷改造」的群體。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種新身分，並從中獲得了歸屬感。新中國成立後，延安知識分子成了全國宣傳、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者。作為解放者，他們自豪而自信，多數人當了官，從原先的兩重身分回到一種身分，成了監督別人進行改造的「領導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把當年他們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給原國統區的人們，直到革命進一步深化，他們被更革命的人打倒。

遇資州教授說，共產黨當然左，或者「極左」，可以指望有不左的共產黨嗎？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在那個革命的年代，共產黨當然是激進的，可是黨的文宣同時也高喊民主和自由，今天的人們或許知道政治是複雜和殘酷的，然而在當年，對於許多人來說，在人間建立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還是有強烈的吸引力的。依照遇資州的邏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期待革命有崇高的人性價值，更不能對革命領袖的個人品格抱任何期望，我們只能圍著篝火跳舞，慶賀那些黨內鬥爭的失敗者、被冤死者升天，因為一革命就必然「極左」，而搞「權謀」也是正當的。可是如此這般，最後是什麼結果呢？只能是遇資州說的：「無論怎麼選，我們都是輸家，都會為虛無的現身埋下伏筆」。遇資州的質疑，可能永遠難以回答，因為它涉及更深邃的歷史哲學層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毀滅的道德基礎的問題。

遇資州提問的另一意義在於，我們過去習慣用的「左」、「極左」是有嚴重缺陷的概念，因為它們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和實質，我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可能不自覺地以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做了觀照的對象。這些黨確實不左，可是它們早已社會民主主義化了，自此之後，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多了一份警惕，這是要感謝遇資州先生的。

7. 關於本人的「思想矛盾」

對於我的「思想矛盾」的問題，我同意蕭功秦的看法，他認為我書中所顯現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我還要說的是，在這十

年，我讀了更多的書，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我也閱讀了許多民間「小人物」的歷史。我讀它們都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義。我想說的是，這場思考持久、艱辛、充滿困惑。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我仍然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展的中共革命和國民黨領導的國家近代化過程，都對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其間產生的左、右極端主義既和兩黨的領袖及領導層的認識水平、知識結構、文化素養有關，更是他們及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作為後人，我們應在新的起點上總結歷史，吸取教訓，將前人的成就、犧牲和失敗轉化為今天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價值的思想遺產。

三、有無必要統一對延安整風的論述？

多少年，我們都習慣了，領導者就某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搞一個結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說來這還是從延安開始的傳統；現在環境變了，資訊和人們的認識也多元化了，再就某一歷史問題搞一個統一論說就大可不必了。

何方先生是一位睿智的長者，一些年來他寫的那些反思歷史、呼籲政改的論述，贏得人們的好評。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改行研究中共黨史，其執著精神也令人欽佩。他對中共黨史、建國後歷史等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許多是很有見地的。例如，他對毛個人崇拜及「不顧惜人命」、「心胸狹隘」的批評（下，頁 418-419），他提出毛對張聞天長期打壓、迫害（下，頁 661）等，這些都是成立的。

然而無可諱言，何方先生的書也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試圖建立對延安整風整體性、結論性的解釋。既為「整體性」，必然伴之以「排他性」，何方先生特別要強調別的任何敘述都不正確，唯有他的研究才是客觀、公正或是符合他心目中「一分為二」的原則。如此一來，他就難免以「正確」、「真理」化身自居，對別家論說做不到客觀公正，其出現謬誤偏差也就在所難免了。

何方先生對本書的批評，除了一處確實是我對史料理解的錯誤，¹⁶其他基本上都是他個人對我的誤讀，其主旨就是想通過他的一些主觀的看法，否定本書，以凸顯他是唯一正確的。例如，何方先生批評我沒有對延安整風「一分為二」，就讓我頗為費解。他舉出整風的「主要收穫和成就」有四項：「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牢固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創立了一整套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效」（上，頁 228、230、231、232）。他還舉出了八條缺點和不足，這就是他對整風「一分為二」的看法，我對其不做評述。相信讀過我的書的讀者，看了何方的這四條和八條以後，就明白了我與何先生的差異，我是根本無意做這種類似於黨的歷史決議的「總結」的。我也不會像何方那樣，「根據劉少奇在延安整風後黨的七大上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中的權威論述和歷史的檢驗」（上，頁 229），對毛澤東思想做什麼「表述」，這些都不是我的研究興趣所在。

何方先生對胡喬木「只下結論，不講根據」的文風曾有過不少批評，我很同意。可是多年來，那種「只有結論，而無事實依據」的文風，早已化為一些人的固定思維和寫作習慣，即使像對此有所警惕的何方先生，也在不自覺中複製此種文風。例如，何方先生很激動地指責本書「談論頗為詳細的〈從毛張聯盟到毛劉聯盟〉，其中把 1937 年的 12 月會議，說成毛的『讓步與等待』，把毛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論新階段〉說成毛的『兩面策略』等，就是個人臆想，遠離事實。至於〈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毛澤東與王明的公開交鋒〉以及什麼『處境尷尬的軍方』、『進退失據的周恩來』等標題，也多是『虛張聲勢』。」（下，頁 689）我對〈論新階段〉的看法究竟是怎麼遠離了當年的事實，本書的上述標題何以是「虛張聲勢」的，何先生應做出具體分析，拿出

¹⁶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頁 225。何方因參加整理張聞天文獻的工作，有其特殊的便利，接觸了至今沒有全部開放的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期間寫的《反省筆記》全文，而其他人只能看到經過選錄的這份筆記的片段，而不得不從已被挖掉名字的 XXX 進行推測，這就難免出錯。儘管如此，我也對何先生深致謝意。

自己的證據，而不是只提出一個判斷。

他又指責我書中對「肅托」造成延安氣氛的變化的相關敘述是「無限誇大的道聽塗說」（下，頁 451），也讓我訝異。我書中寫到，1938-1939 年延安的肅托是秘密機關進行的，由於各單位不時發生人員神秘失蹤，不久就傳來失蹤人員是「托派」的傳言，讓延安的幹部黨員都患上了「托派恐懼症」，「聞托色變」。這些都有充足的資料依據。何方當時只是一個來自西北小城鎮的 16、17 歲的小青年，不是「肅托」的重點懷疑人群（有留蘇經歷，在蘇受過處分；或是國統區大學生，曾自發組建馬列組織或閱讀過托派書籍，與托派人員有往來者），不與聞這些事是完全可能的，怎麼可以以自己的個別經驗就否定我的論說？

何方先生還說，本書把「任弼時說成是配合毛『借洋師助剿』王明的『高級說客』」，「同樣是沒什麼根據的」（下，頁 690），因為「任弼時在延安整風中並不是隨便緊跟毛澤東跑的人」。然而本書並沒有隻言片語及任弼時在延安整風中「是隨便緊跟毛澤東跑的人」，而是很明確寫到「任弼時為人較為方正，在整風初始的關鍵時刻，難免顯得礙手礙腳，將其暫時打發一邊，不讓他與聞某些機密，以待其『覺悟』，可能是毛澤東暫時貶謫任弼時的原因。」（《紅太陽》，頁 311）

由此觀之，何方先生的這種文風是很有問題的，說輕了是自以為是，實事求是地說，根本和被他所批評的「胡喬木學派」有異曲同工之處，也是「權力話語」的流風遺緒；講得具體一點，就是以為自己是站在「正確」的制高點上，只要看到誰不順眼，隨手便拿出一頂「帽子」給對方扣上就可以了，根本毋須進行認真的論證。「權力話語」不一定就是當官者所獨有，胡喬木因有現實的權力和「理論家」的桂冠做後盾，他的許多言說可被歸類為「權力話語」；何先生則因經歷過延安整風，是一位「老延安」，從而產生「唯我正確」的強烈優越感，他的一些言說說來，也是一種「權力話語」，因為順著不可遏制的道德優越感，何先生也在試圖建立對延安整風運動整體性、結論性的解釋，而這

種思維和敘述本身就暗藏著「權力話語」的基因。

另外，何先生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他的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須依賴學界過往的研究，他主要是從別人，特別是我的書中已詳細標明的引用資料中按圖索驥，利用這些資料做研究。他大量轉引了我書中的資料，對此只要在註釋中加以說明，表明自己是轉引自何書、出之何處就可以了，但是何方先生卻吝於這樣做。僅舉一例，他的書中引用了 1943 年 6 月 29 日劉少奇給陳毅、饒漱石電報的內容，可是這條資料是從天上飛來的嗎？他在註中只寫了這條電報的名目，卻故意不說明資料來源，這是因為我的書中交代得清清楚楚，這條電報是收在 1989 年內部出版的國防大學編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17 冊第 379 頁。他摘引自我書，卻有意隱去出處，類似的例子在他的書中不勝枚舉。內行人都知道，史家收集資料及在紛繁駁雜的史料中爬梳整理出線索是何等不易，何方先生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別人多年辛苦搜集的材料拿來就用而不做任何說明，這也是不尊重別人勞動成果的一種表現。我也始終不明白：何方先生是老前輩和「老延安」（在他的書中，他對此一再強調），我的書出版於他的書前，他也吸取了我書的不少觀點（除個別做了說明，用他的話說，叫做「參考」，絕大多數不引出處），用了我書中的許多材料（除個別外，他也都不做說明），怎麼一提起我的書，就火冒三丈？

四、餘 話

眾所周知，思想的駁詰、學術的爭論有賴於一個公平、開放的學術平台，其前提是學術書籍的自由流通。雖然本書所談論的歷史事件已過去六、七十年，但仍被認為是涉及「敏感」，甚至於今天內地某些著名圖書館有我書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館內閱讀。儘管如此，國內外一些高校的學科將我的書列為教學參考書，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學術著作、論文中，也有許多學者引用拙作。

由於不准本書公開進入內地，2003 年有讀者私下帶入，遭到海關沒收，當事人還為此事打了一場官司。不僅如此，前幾年內地還出現了我書大量的盜

版，遍布全國各地，對於這種侵權行爲，我確實感到不滿，但無能爲力，十分無奈。

這些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對延安整風的看法有無改變？就我個人而言，這十年，對延安整風的基本觀點沒變，但對我所論及的題目，有更深的認識，這就是：現代農民革命融合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發展到一定階段，爲了更大的發展，就需要定朝綱、定禮儀、排座次，這可能是東方大國共產革命勝利的必經之路。其間結合了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監督，將毛的思想內化，形成巨大的動員效用，創造了一種戰爭年代下政治動員、黨內思想清理和組織清理的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成就了中共 1949 年的勝利。

對於這套模式，毛非常自負是可以理解的，連他的對手蔣介石也很欣賞和羨慕。1944 年 1 月，蔣介石還對此表示反感，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中共之獨裁方式，業已造成，而在陝北控制社會與生產，亦已見成效，……蓋民眾雖被其控制，但不能持久，只要我軍隊到達其地，民眾必歡迎我之解救也。」¹⁷1945 年 9 月，他又在日記中指責中共實施「階級獨裁」，所到地區「信仰、言論、行動，皆絕對統制而無自由」，¹⁸但是隨著抗戰結束後內戰再起，國民黨在戰場不斷失利，蔣介石卻高度肯定延安整風的模式，稱讚其爲「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辦事方法」，¹⁹然而，真正仿效、借鑒延安整風，還是數年後在台灣進行的「國民黨改造運動」。

正因爲延安整風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國後被奉爲治國方略，只是，促使革命勝利的的方法以後卻可能成爲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風以政治運動治理國家的鬥爭模式，在革命戰爭年代中爲樹立領袖權威、執行革命任務，動員和規馴人群、進行思想和組織清理，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建國以後政治環境變了，治理國家的方略也應與時俱變，遺憾的是這個變化比較遲，一直到文

¹⁷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卷 5（下），1944 年 1 月 20 日，頁 473。

¹⁸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5（下），1945 年 9 月 29 日，頁 839-840 頁。

¹⁹ 蔣介石，〈幹部同志對敵最後決戰的方法與理論鬥爭的準備〉，收入蔣總統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集》（台北：國防研究院，1968），冊 2，頁 1626。

革結束鄧小平、胡耀邦時代才改弦易轍。

如果再往深處去想，這種鬥爭模式遲早是要出問題的，其原因就在於，1950年代後建立起來的新結構是一個混合物，經濟建設中的蘇式技術理性主義雖然表面上一時佔了上風，但更堅固的內核還是延安的經驗。因為勝利者用來統合社會的方法還是各種類似整風的政治運動，而崇拜領袖、強調服從、輿論一律、等級森嚴、重視革命血統和強烈的「江山」意識、槍桿子第一、運動群眾、知識分子必須長期改造等等，構成了新法家專政的要素。然而，蘇式技術理性主義畢竟有它自己的一套語言，並發展出自己的利益，這就對毛澤東的無上權威有一定的干擾，於是毛的烏托邦主義經常去動搖它的穩定性，最後毛決定打破並重建這個結構，這就是文革。但文革建立的新結構比1950年代更加專斷、更以絕對主義為特色，這才有了文革後鄧小平、胡耀邦的深刻反思和改弦更張，這是就短期歷史來觀察。若從歷史長時段看，在許多情況下，嚴刑峻法都是大一統政權開創時期的基本特點，都是只能搞幾十年，都要被後來者加以調整，所以，有關延安整風的許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這些年，不少朋友和讀者詢問本書何時修訂再版。我的基本想法是這樣：

1. 將保留書的原來結構，只修訂一些錯訛之處，包括個別史實和文字方面的錯誤。
2. 主要是補充一些新的資料，使之融入到有關敘述中。2003年俄羅斯解密的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檔案，內含大量電報原件，其中多數為首次公開。這些電報反映了1931-1937年中共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和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我書的判斷。1986年楊尚昆的一次談話，涉及上海臨時中央、中央蘇區以及延安時期的許多重大事件，其精神和我的書不謀而合，也印證了我書的觀點。對於這些新材料，我都會進行整理，將其吸取到修訂本中。
3. 我在修訂本中，還將使用一些經歷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同志及他們的後

代贈送給我的資料。例如，西安張宣的回憶錄、鄭州郭曉棠家屬保存有關河南「紅旗黨」冤案的材料，以及李新回憶北方局整風的資料等等。總之，我會對近十年披露的各種資料認真進行考辨，並將它們吸收到本書的修訂本中。

以上只是修訂的初步計畫，重拾十年前舊作，「萬千心事難寄」，在下一步的修訂過程中，我會把對那些歷史上的人和事的新研究、新感悟融入書中。總之，我希望能把修訂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使得本書可以更充實一些。完全地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過進一步發掘資料和細緻的研究，儘可能地去接近歷史事實。這是十年前出版本書的心願，現在仍然是我的目標，我會繼續努力。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
-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
- 葛劍雄、周筱贛，《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蔣總統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集》，冊2。台北：國防研究院，1968。

二、論文

-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頁 29-36。
- 陳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二十一世紀》，2001 年 6 月號，頁 143-148。
- 遇資州，〈誰是「我們」及其「敵人」〉，《二十一世紀》，2000 年 8 月號，頁 143-146。
- 蕭功秦，〈拒絕殘酷的美麗〉，《明報月刊》，2000 年第 10 期，頁 106-107。

A General Reply to Criticisms of *Hong Taiyang (Red Sun)*

Gao Hua^{*}

Abstract

This reply deals with three issues raised by critics in regard to my book: first, the charge of one-sidedness, or that I only discuss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rying to outwit each other and not the high degree of trust and openness among party leaders; second, that I should not be saying that the entire CCP completely lacked the values of democratic liberalism and humanism; and third, tha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my sympathy for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my rejection of it. My reply considers each of these issues,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the points of the “old Yanan hand” He Fang. I believe that contemporaries do not fully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at the time. He Fang was led to misread my book due to his pride in being an old Yanan hand, but his fixed views did not allow him to accept different opinions. *Hong Taiyang* was not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in China, but pirated editions became very popular, showing that it could pass a certain kind of test; and indeed, newly discovered sources have supported its main arguments. The second edition of *Hong Taiyang* will correct obvious mistakes but maintain its basic framework. In particular, I emphasize the background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how, after the victory 1949, “rectification” was made into a governing strategy. This led to disaster. Coming to power, Deng Xiaoping proclaimed the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abandoned rectification, but it was too late.

Keywords: *Hong Taiyang*, *Red Su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Yanan, Mao Zedo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